



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

内容提要 在日本,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已经有长达 90 年的研究史。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和“灭共”研究到战后初期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好奇、同情而进行的探讨,经过对革命的反思到 21 世纪以来的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是将革命根据地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脉络之中。日本学界较早突破了阶级分析的单一方法,关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集团和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宗族、地方组织、宗教团体、土匪、移民、青年、女性以及村落内的互助和恩仇等。在研究方法上,日本学界重视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注意到中国社会的非身份制特征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乡绅论出发,引申出了对于根据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人物的社会作用研究。在对根据地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他们较早认识到这并不只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包括村落权力、权威结构的根本变革。其研究体现出了社会革命史的取向。

关键词 日本对华研究 根据地 农民动员 基层干部

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学术史研究和综述在中国和日本都已有许多成果。^①本文试图对 90 年来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在研究主体和研究资料上有明显的连续性。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为重点,不但是由于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最多,更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成了后来中国社会的基本雏形。中国学界除了众多学术会议的综述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这些文章基本是就一个领域或某一个根据地的研究进行综述,例如农业合作化、婚姻家庭以及金融建设等方面,或者是关于井冈山、闽浙赣、晋察冀等根据地的^②,重点在对于研究成果的概括介绍。但是,由于对专题和地区上的研究成果总结、概述划分得太细,很少进行宏观分析和比较,导致了对于一些带有共同性的或规律性的研

① 在日本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部分研究者对中国共产党持负面评价,也使用了一些贬义词,但为了全面介绍日本方面的相关研究情况,使读者对其能够有完整的把握,本文对这部分内容原样呈现,请读者明察。

② 例如:黄正林:《1980 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综述》,《河南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凌弓、唐莲英:《近十年来毛泽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扬州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张洪芳、张文光:《近十年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4 期;杨雨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研究综述》,《法制博览》2015 年第 15 期;陈始发、张勇:《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苏区研究》2016 年第 1 期;贺文乐:《革命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17 年第 1 期;吴云峰:《抗日根据地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综述——以 1980 年以来研究为例》,《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究动向和趋势重视不足。另外,由于对国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关注不多,因而出现了在对于国内研究成果的意义和特征的评价上缺乏国际学术对话意识和针对性。日本学界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的学术成果总结也不在少数^①,主要是就某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从学术贡献角度进行评价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本文对于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学术史回顾与以往的这些学术综述或总结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两点:首先是关注研究史上的范式演变问题,即关注到不同时期的研究者们的研究立场和心态的转换,这种转换不但与日本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也与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世界潮流的演进相关。如果不涉及不同时期研究者的立场和心态,就不能完全理解其研究成果的深层含义和价值取向。其次,关注宏观史学理论对根据地史研究的影响。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在学科分类上属于专门史,这种研究与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日本史学界,东洋史的研究理论和观点、概念上的变化会很快反应在对于根据地史的研究上,如果没有对日本东洋史研究理论及其变化在总体上的了解,就不能把握日本学者关于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方法特征。

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中共革命根据地史一直占有重要位置。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权威石川忠雄曾在1959年说:“我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与外国相比不但历史长久而且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种研究更加活跃起来。”^②日本学界把对中共根据地的研究作为了解近代中国共产革命和中共政策形成与运用实践的具体现场,特别是将其作为分析、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制度起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与西方学者相比,日本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对于中共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背景,更加重视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进行实证性、长时段的研究,也更关注自下而上地分析民众接受中共政策的社会历史基础,将革命根据地史纳入到中国社会经济整体结构演变的宏大历史脉络之中。

其实,日本的这种研究早在中共革命根据地诞生不久就开始了,当时主要以情报收集为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消灭中共抗日根据地,由华北方面军成立了所谓“灭共委员会”,专门对中共及其根据地进行调查分析。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许多中国问题研究者对于中国革命带有好奇或同情的心态,多持肯定观点。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学界对以往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进行反思,改变了以前的一些观点,有的学者则专门探讨所谓的“阴暗面”。当然随着可以利用的史料大量增加,研究也走向深化。进入21世纪以后,年轻一代的日本学者充分利用资料和便于在华调查的优势,积极开展与欧美学界的对话,在继承日本东洋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其研究观念和方法呈现多样化,成果显著。本文仅就日本90年来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从学术史上作初步的梳理。

一、前史:情报收集与“灭共”研究

日本对于中共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与研究从战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以情报收集和对策研究为主。

① 日本关于中国革命和根据地问题研究的综述主要有如下成果:宇野重昭编『中国共産党史研究の現段階』、アジア政経学会、1974年;井上久士「日本における抗日根拠地研究の動向」、『近きに在りて』第5号、1984年5月;天児慧「序章 中国革命史研究の現況」、『中国革命と基層幹部』、研文出版、1984年;田中仁「序章」、『1930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産党の危機と再生——』、勁草書房、2002年;本庄比佐子「中国ソビエト運動の研究」、井上久士「抗日根拠地論」、野沢豊編『日本の中華民国研究』、汲古書院、1995年;小林弘二「序章」、『20世紀の農民革命と共産主義運動——中国における農業集団化政策の生成と瓦解——』、勁草書房、1997年;安藤正士「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新潮流」、『東アジア地域研究』第5号、1998年8月;高橋伸夫「補論一 中国共産党と農民革命——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党と農民 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研文出版、2006年。

② 石川忠雄『中国共産党史研究』、『はしがき』、慶應通信、1959年、1頁。

战前的大量情报调查资料为战后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提供了基础,例如草野文男这样的研究者,战前在外务省情报部和调查部从事对华情报工作,战后在拓殖大学任教继续从事中国研究。仁井田升在研究中国婚姻法律时就使用了战前外务省情报部的调查资料。^① 石川忠雄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也利用了陆军省参谋部和外务省的调查资料。近年,高桥伸夫依据日军《剿共指针》等资料从日军的认知角度揭示出了根据地中共党员的某些特征。^②

当中共革命根据地刚刚诞生,1928年12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根据外务大臣田中义一的训令提交了关于中共活动的调查报告。^③ 进入1930年,中共根据地在各地陆续建立,引起日本高度重视,因而形成了一批大型调查报告。日本外务省组织在中国各地领事馆对于各馆附近的中共根据地开展调查,主要在九江、长沙、汉口、沙市、大冶、芜湖、广东、福州、香港和汕头进行。资料内容包括在九江被检举的中共党员的职业;红军一时占领长沙及岳州后的活动状况;红军的组织和联络方法;广西百色和广东海陆丰根据地的创建;福建省内各地红军人数、武器及与国民党军作战状况的详细统计;广东和福建地区国民党军进行围剿和地方“受害”状况的统计等。^④ 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桑岛主计和公使馆书记官好富正臣于这年8月对中共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调查。他们在报告的结论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相关,即近代无产阶级产生,但由于封建制度的影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悬殊;国民深受军阀战争的损害并已开始出现抵抗;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税赋沉重;由于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运动出现等。另外,由于中共红军武器简陋,且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处于半隔绝状态,中共不可能像俄共那样通过占领中心城市来一举控制全国,所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完全赤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各种影响必须加以注意。^⑤ 驻南京领事上村伸一向外务大臣提出关于中共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根据中文文献分专题研究的,其中还附有详细的中共组织系统图表。^⑥ 这套资料也得到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的协助,篇幅庞大。^⑦ 1931年,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完成了大型研究型报告书,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蒋介石政权对于中共根据地的围剿并不顺利,江西土地问题严重,农民运动还会继续扩大,中国的共产革命也将会波及日本。^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于中共的动向更加关心,特别是在八路军挺进华北,根据地初步创建之后。深田悠藏对陕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财政经济和民众运动进行研究,认为中共挺进国民党的失地,组织抗日力量,进行游击战,其势力值得高度重视。^⑨ 中保与作通过对共产国际和

① 仁井田陞『中国の伝統と革命1』、平凡社、1974年、154頁。

② 高橋伸夫『党と農民 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197頁。

③ 「中国共産党状況/1928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02475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④ 「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付屬物 第十卷 1. 中南支地方中国共産党及共産軍調査」、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022500 - B04013023600、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附屬物 第十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 「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匪行動状況調査方二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016600 - B020320168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中・南支地方共産党及共匪行動状況実地調査関係(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 「支那共産党及共匪二関スル研究資料卷一送付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2005200 - B02032005300、支那各地共匪関係雑纂 第十三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 「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附屬物 第十二卷 1. 中国共産党及共匪研究資料」、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4013025000 - B04013025300、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附屬物 第十二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⑧ 「中華民国に於ける共産主義運動の現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4010494000、中華民国に於ける共産主義運動の現況(国立公文書館)。

⑨ 深田悠藏『支那共産軍の現勢』、改造社、1939年、35—40頁。

中共的研究,认为苏联和中共才是日本的真正敌人。^① 1938年以后,由于中共抗日武装建立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日军愈益感到威胁。岩谷将的研究显示,这时日军重点开展了所谓的“灭共”研究。日军华北方面军于1938年11月成立了“灭共委员会”,专门对中共进行调查。委员会下设的调查部,由于地址设在北京西城皇城根,为了保密,对外称“黄城事务所”。调查区域包括山西、察南、冀南地区。其调查报告以月报形式提供给华北日军。其他部队和宪兵部的调查报告也都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汇总后以《方参特报》等形式发布。此外,傀儡组织“新民会”除了向第二课提供情报之外,自己也编写《共产地区调查报告》等,参与对共调查。^②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于1941年通过对华北中共和八路军的研究认为:华北的治安和建设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却潜伏着一个重大病根,并且其威胁在不断扩大,这个病根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游击队用世界上最简陋的武器与“皇军”进行了3年多的抗争,其对民众的组织动员能力不断增强。中共和八路军的最大特征就是这个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宣传鼓动者”和组织者,中国4亿人口中有3亿5千万是农民,因此中共可以组织起庞大的农民队伍。通过组织、宣传,中共的影响已扩大到了整个华北。中共实行对军队的完全领导,通过政治工作在强化部队战斗力的同时,还发动、组织民众,甚至利用日军士兵的不满进行反战宣传,从内部瓦解日军。^③ 日军甲集团参谋部编写的关于审讯战俘的方法手册中对中共组织和党员状况进行了分析,手册中将中共党员按军队党员和地方党员分开论述,认为军队中的党员是那些战斗勇敢,具有服从精神,能忍耐艰苦并且对家庭并不执着的人。根据对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第一团的统计,在战斗负伤的262人中,党员达182名,可见党员的抗战意识更强。与军队党员要求完成战斗任务的目的不同,中共在农村是为了团结贫农开展阶级斗争,所以中共在发展农村党员时更注重其阶级成分。虽然现在中共表面上搞统一战线,实行三三制,但这不过是一时策略,党员阶级成分依然重视贫农和工人。^④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抗日根据地在中国社会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尾崎秀实就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发生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表现就是农民战争,抗日战争则促进了这场社会革命的发展。中共把抗日作为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政治实际上就是给予农民以权利,其政策是以农民为中心的。^⑤ 这种分析颇有见地。

二、冷战时期的研究:对中国革命的好奇与同情

在冷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问题开始显现,而独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了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兴趣。正如小林一美所说的,那时他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十分关心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政权抱有亲近感。^⑥ 日本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于中国革命持好奇或同情的态度,赞扬这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变革意义。日本历史学者则竭力想从中共

① 中保与作『最近支那共産党史』、東亜同文会、1940年、13—16頁。

② 岩谷将「華北における日本陸軍の中国共産党(軍)調査目録」、『近代中国研究叢報』第31号、東洋文庫、2009年3月。

③ 「4/第7 中国共産党と第八路軍」、「4/第1 中国共産党とは何か」、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1111491100、C11111489400、北支那方面軍 昭和16年度 肅正建設計画 昭和16年2月26日—16年4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附録 第2 捕虜訊問の要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3032220800、情報勤務の参考 昭和18年7月(防衛相防衛研究所)。

⑤ 尾崎秀実「独ソ開戦と重慶の立場」、『尾崎秀実著作集』第3巻、勁草書房、1978年、262—264頁。

⑥ 小林一美『中共革命根拠地ドキュメント:一九三〇年代、コミンテルン、毛沢東、赤色テロリズム、党内大粛清』、御茶の水書房、2013年、i頁。

领导建设根据地的历史来理解1949年后的中国,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受到冷战体制下资料和交流的限制。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料状况有所改观,除有大型文献集出版外,根据地报刊也得到利用。

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中国社会的原始共同体没有彻底解体,因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是一种停滞的社会,只有依靠外力作用,共同体的各种关系才能被打破,才能最终摆脱停滞。从共同体理论演化出了“社会停滞论”,进而发展成对华“侵略有理”论,这种观念在近代日本根深蒂固。战后日本东洋史学的出发点就是否定这种共同体理论和社会停滞论,承认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并从历史上追寻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由此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出现了关于历史分期和市民社会问题的大讨论,而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主要的课题则是肯定共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促进作用。这期间,日本史学界为了克服以西方社会历史阶段为标准和中国王朝体系的观念,提出了民众史的研究史观。安丸良夫对于日本民众的自律性和起义所进行的卓越研究启发了东洋史学者^①,他们把民众看成是介于庶民·群众和人民·国民之间的一种群体。^②森正夫就提出,民众的意识、观念和传统对于革命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革命形势的形成首先就是由于有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对于这一点时刻不能忘记。他们对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也从民众史的角度思考,特别要探讨中共是如何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的。^③这种民众史观点在下面提到的小竹一彰、天儿慧和内田知行的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

1972年,由山本秀夫和野间清主编的《中国农村革命的展开》一书系统研究了中共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历史 and 意义。其中,古岛和雄对旧中国的土地所有状况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否定了战前关于中国社会的共同体理论,同时又强调也应注意到中国村落具有较强社会关系的特征。他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的特征,是在由集市构成的区域社会中人的结合性较强。在农村社会中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就是地主制。地主豪绅控制农村,超越农村集市的商品流通都被地主制所吸收,因而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形成,造成地域社会的封闭性。帝国主义的入侵也未能打破地主制的封闭状态,反而由于他们同地主、买办相结合,使得农村封闭性更加强化。而中国共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推翻封建地主的统治,由此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山本秀夫通过对根据地土地纲领的分析,指出共产革命打破了几千年来专制统治基础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制。野间清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研究,对中共土改的意义进行了高度评价。野间本人曾参加东北地区的土改工作队,研究中结合了自己的亲身见闻和情感。^④当时的新一代学者中对于中国革命抱同情态度的不在少数。如加藤祐三便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充分肯定。^⑤不同的是,从战前就开始对中国农业进行研究的田野元之助对中国土改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共的土地改革造成大量零散小农出现,不利于规模生产,因而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⑥

山本秀夫在《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中认为,中国自宋代以来,基于血缘主义的结合关系已经消失,出现了以同族共有土地为基础的同族集团的再形成,同族共有土地由同族的支配者即大地主

① 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衆思想』、青木書店、1974年。

② 増井経夫『中国の歴史と民衆』、吉川弘文館、1972年、85頁。

③ 森正夫「民衆反乱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野沢豊、田中正俊編『中国革命の起点』(『講座 中国近現代史』1)、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④ 古島和雄「旧中国における土地所有とその性格」、山本秀夫「土地革命戦争期の土地綱領の分析」、野間清「第3次国内革命戦争期および1959年期の土地改革」、山本秀夫、野間清編『中国農村革命の展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2年。

⑤ 加藤祐三『中国の土地改革と農村社会』、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2年。

⑥ 田野元之助『中国の土地改革』、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2年。

所掌握。到了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共同体关系基本被破坏,进入到官僚(包括军阀)、地主阶级专制统治的阶段。由于地主和官僚统治的相互结合,以地主阶级为主体构成的土豪劣绅成为官僚统治的一环。要推翻官僚劣绅统治,就必须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历代中国农民所追求的理想就是土地平等,而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革命就是要实现这种平等。在根据地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发现,中国农民并不希望土地国有化,而是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因而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分配给农民,这就成为根据地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则。农民革命所建立的根据地政权是由劳动者和农民掌握的政权,这种政权并不是与农村社会脱离,而是融入农村社会。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就是中共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所以中国革命就呈现出武装斗争的形态,而农村革命的立足点就是根据地。^① 山本高度评价了中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意义。

藤井高美肯定了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他认为,毛泽东鉴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巨大能量,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其内容包括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核心的土地革命,对于劳动者、农民和党员进行再教育,建成自己的党组织。土地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支撑武装斗争就需要有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是三位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广大农民与国民党进行斗争。^② 竹内实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并由此形成了中共领导体制的原型。中共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组织,同时在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统帅这个集团的活动家并成为独自的领导层。这种由统治性的领导者和高度组织性的集团所构成的体制与中国官僚制度传统有关。^③ 石川忠雄围绕立三路线与留苏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两派对于当时革命形势与战略的认识,指出两者虽然有些差异,但是在理论和战略上,本质是一致的,由此他提出对于两派的对立可以从权力斗争角度分析。关于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当时留苏派、毛泽东以及共产国际都是要将其与苏维埃革命联系起来,形成下层抗日反帝统一战线,三者基本没有区别,所以不能将八一宣言以前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失误仅仅归为留苏派的责任。^④ 这种研究与当时的路线斗争史观不同,否定了一种路线一贯正确而另一种路线完全错误的流行观点。

野村浩一对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实践和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就在于按照无产阶级的观点在农村建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做指导,加强党内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亚洲形态”。野村认为,游击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战略。由于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和战术,这就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的根据地战略、战术对于此后的世界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⑤ 今堀诚二对比研究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他认为,土地革命时期虽然实行改革,分给农民土地,但是没能使农民在得到土地后提高生产,农民的生存价值没有充分实现,由此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中央根据地失败的一个原因。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减租减息政策,联合各个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同时中共并没有放弃其领导权,努力将无产阶级意识渗透到各个阶级,将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统一起来,使边区得到发展,这就是日军失败的原因。^⑥ 野村对毛泽东的根据地土地革命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在1930年末到1931

① 山本秀夫『中国の農村革命』、東洋経済新報社、1975年、21—63頁。

② 藤井高美「農村革命根拠地の樹立に関する一考察」、『アジア経済研究』第9巻第1号、1962年4月。

③ 竹内実『毛沢東と中国共産党』、中央公論社、1972年、2—7頁。

④ 石川忠雄『中国共産党史研究』、182—197頁。

⑤ 野村浩一『中国革命の思想』、岩波書店、1971年、77—116頁。

⑥ 今堀誠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序説』、勁草書房、1968年、153—174頁。

年初,井冈山土地法出现了从土地公有到土地归农民所有、可以自由买卖的政策转变。对于富农的敌视政策在清除了第三次极“左”路线后也趋于稳健。抗日战争时期停止没收土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行耕者有其田,这说明中共的土地政策会根据当时尖锐的政治状况进行改变。但是,毛泽东土地思想的核心却一直包括以下两点:第一,不分男女老幼,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实行彻底平均;第二,将敌人限定在少数,与中农甚至富农结盟,集中打倒地主阶级。以上两点,本来存在着矛盾,但是在现实的农民运动中却相互依存,形成互补,这就是毛泽东土地思想的核心。^①

仁井田升从法律史的角度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中共婚姻法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法对于妇女的保护最为优厚,由于当时妇女在经济上难以独立,所以强调保护妇女,离婚后的义务和责任主要由男方负担。1950年的婚姻法则规定债务要由夫妇共同生活时的财产返还,并增加了离婚前的调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根据地的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完全否定旧家族制度,对于离婚理由没有规定。1950年的婚姻法则规定,当一方提出离婚时对于离婚的理由要由法院裁定。这揭示出革命时期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婚姻法在维护妇女权益和家庭方面的轻重差别。^②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也出现了对根据地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动向。小竹一彰根据《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等资料,借用美国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对解放区的民众运动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具有量化研究的色彩。他提出,反汉奸运动在农村被不断扩大,从反汉奸扩展到反恶霸、反贪污,恶霸的含义也被逐渐泛化,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这是农民对整个旧制度不满的表现。按照群众的要求,这种斗争扩大到了经济上的清算,这是在中共对农村的领导力量一时不足的情况下,民众运动自行发展的结果。由于在运动中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获得的利益过多,引起民众不满,根据地不得不要求干部和积极分子退赔,进行整党。这场运动从高潮到整顿的过程也与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到粉碎其进攻的战局转变有关。^③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天儿慧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基层一时出现了重大差异。中央的土地政策是从与国民党斗争的政治战略提出的,即使基层出现了分田运动,中央还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在土地法大纲中还提出保护中农,对于富农及开明地主也要照顾。这与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有关。但是,在基层民众却出现了诉苦和分田的激烈行动,由此出现了土改中的上下不一致问题。^④

天儿慧关于革命根据地基层干部的研究曾引起学界关注。他依据当时仅能看到的《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等基本资料,重点研究根据地农村的基层干部,强调了他们在上级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重要纽带作用。他特别关注到存在于体制变动背后的民众运动的机制问题,开创了从下层即民众角度研究干部的方法。他认为基层干部是政治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他们决定了大众运动的政治特征并使得政治运动呈现出多样性,实际上许多干部是达不到上级要求的。天儿慧指出在农民合作活动中产生的基层骨干以及那些积极分子才是农村政治变动中的实际推动者,他们许多是不属于组织体系当中的所谓正式干部,但这些人对于中共政策的实施有重大补充作用。他探讨了干部的“公”“私”问题。认为干部开始参加革命时都带有强烈的“私”的情感,这些人以前极度贫困、受到压抑,希望通过斗争得到土地房屋并获得解放,因而对敌斗争坚决。但是,当他们掌权以后本应该从“公”的立场行事,但有时却利用“公”来谋“私”,如果把“私”放在首位便会与大众发生对

① 天兒慧「土地革命と毛沢東:1929—30年赤色根拠地における闘争を中心として」、『一橋研究』第1巻第1号、1976年6月。

② 仁井田陞『中国の伝統と革命1』、151—156頁。

③ 小竹一彰『国共内戦初期の土地改革における大衆運動』、アジア政経学会、1983年。

④ 天兒慧『現代中国政治変動論序説——新中国成立前後の政治過程——』、アジア政経学会、1984年。

立,而整党就是要解决这种继续以“私”优先的干部。天儿慧还将晋冀鲁豫地区和陕甘宁地区的干部作用进行了比较,认为在陕甘宁边区民众运动基本是按照上级指示渐进开展的,干部发挥主导作用。而在晋冀鲁豫边区民众运动有时会出现爆发性的非合理性行为,干部也不得不追随群众。对于解放战争时期土改中的急进问题,他认为贫农路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中央提出的是广义的贫农路线,就是要按照农村最广大的被压迫的贫农的立场开展运动,但是在基层则是狭义的贫农路线,只是为了满足贫农的要求而伤害到其他中间势力的利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基层发生了“自下而上的革命”。^① 对于基层社会中的村干部、劳动模范和中共骨干的研究,其后还有佐藤宏、谷川真一、滨口允子的研究。^② 这种研究与日本乡绅论的研究有关。在日本战后关于共同体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关注到士大夫的伦理及其对共同体的维护机能,由此导出乡绅论的研究。^③ 其实战前清水盛光、根岸佶已经关注到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作用问题。^④ 战后内山雅生提出了乡绅统治具有维护共同体的机能,乡绅把对乡村的行政统治与共同体的公共管理机能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双重统治。^⑤ 这些理论对其后的根据地基层干部研究有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日本史学界特别是研究日中战争史的学者对于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小野信尔认为八路军连续苦斗恶战,对日军造成很大威胁。正是由于根据地的斗争使得日军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必要的“现地自活”政策无法实现,日军掠夺粮食以及其他资源的活动受到巨大阻碍,虽然日军实行强化治安,搞“三光”政策,但是中共依靠人民战争、大生产运动和统一战线,克服了这些困难。^⑥ 江口圭一提出,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日本陆军向太平洋战场投入12个师团,39万人,只占陆军兵力的18%。但其20个师团,占陆军兵力29%的62万人依然被钉在中国战场。华北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由此提出“一切政策要集中在对中共势力的围剿”上。^⑦ 井上清也提到,1943年以后,华北八路军解放区不断扩大,日军处于被动。^⑧ 这些都肯定了中共根据地的重大作用。

日本学界一贯重视对于中共基本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其中的标志性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和《毛泽东集》^⑨,这些资料的出版为其后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三、20世纪末期的研究:反思革命与研究的深化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学界在对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与冷战时期相比,那种对于革命的好奇、憧憬与同情的态度

① 天儿慧『中国革命と基層幹部』、研文出版、1984年。

② 关于佐藤和谷川的研究详见下文。滨口的研究请参见滨口允子「第一章 村と幹部」、三谷孝他『村から中国を読む 華北農村五十年史』、青木書店、2000年、113—150頁。

③ 葭森健介「中国史における『社会』と『人間』の把握をめぐる——共同体、地域社会、モラル・エコノミー——」、『中国——社会と文化』第7号、1992年6月。

④ 清水盛光『中国の鄉村統治と村落』、日本評論社、1949年。根岸佶『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指導層』、平和書房、1947年。

⑤ 内山雅生『現代中国農村と「共同体」——転換期中国華北農村における社会構造と農民』、御茶の水書房、2003年。

⑥ 小野信尔『人民中国への道』、講談社、1977年、165—166頁。

⑦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86年、194—195頁。

⑧ 井上清「近代日本史における日中戦争」、井上清、衛藤瀛吉編『日中戦争と日中関係——蘆溝橋事件50周年日中学術討論会記録』、原書房、1988年。

⑨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中国部会編『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全12巻、勁草書房、1970—1975年;竹内実監修、毛沢東文献資料研究会編『毛沢東集』全10巻、北望社、1970—1972年。

和观点出现大幅退潮,而对于中国革命的所谓“阴暗面”研究一时成为热点,这包括对于根据地内部肃反运动、AB团事件的发掘,还有关于根据地鸦片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对于根据地的研究,由于资料的不断丰富和视角的多元化也走向深入。

田中恭子的《土地和权力——中国的农村革命》一书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著作。该书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于农民支持中共的理由并不是仅仅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对于土改运动发生“左倾”的原因也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探讨。田中认为,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农民的支持,但是这种土地改革并不单单是一种土地的再分配,还包括土地以外的财产,以及权力、权威的再分配,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内战的情况下,对于农民来说支持中共会给自己甚至整个家庭和亲友带来生命、财产上的危险。如果国民党重新占领解放区,中共的改革会被取消,家庭和亲友也会遭到报复。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支持中共就需要一种强烈的动机。如果土地改革就是动机,那么,是土改的哪些内容产生了作用?如果仅仅是为了土地这种物质利益,那么农民真的会为此赌上生命吗?田中认为,仅仅通过物质利益来解释农民的动机是不充分的,通过土地改革而高涨起来的政治意识才是农民的主要动机。正是由于“算旧账”“反贪污”“反黑地”“反恶霸”“反汉奸”等一系列运动才唤起了农民的斗争热情。田中的研究显示出了在根据地研究中对于以往的单纯阶级论方法的突破,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① 其实在战后关于共同体的论战中,日本学者就较早关注到仅仅通过经济动因进行分析的不足。增渊龙夫就提出汉高祖集团的性质是一种非经济的人格关系即任侠关系^②,滨口重国也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皇帝与一般民众的统治关系,而不是私有大土地占有的内部经济和阶级关系。^③ 其后,足立启二揭示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由国家直接统治的,农民战争首先是针对国家政权的政治特征^④,对以往的“经济—阶级论”观点提出修正。

事实上,相对于根据地土地改革的经济意义,田中恭子更加关注其政治方面。对于农民支持中共的原因,田中认为,首先,农民最关心的是自己和家族的安全,大多数农民是在相信中共军事上会取胜,或在这一地区具有保卫能力时才做出决定。其次,农民所关心的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利害得失。一般来说与上级合作能够得到好处,但是他们不会为了支持中共而背叛家族和朋友,很多情况下是在上级和家族之间做出最有利的选择。农民最后关心的才是经济利益。与生命的危险和周围人的敌意相比,经济利益的考量就要轻许多。只有在响应中共的动员没有很大危险并符合一般道义的情况下农民才会参加革命。再加上经济利益,才会最终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从田中开始的新一代学者对于农民的分析较多采用西方行为科学的观点,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田中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农村革命方法,到了内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通过土地改革进入农村,与农民广泛接触,依靠组织对农村的土地制度和权力结构进行改造,通过党支部掌握村干部。作为在村一级能进行如此社会变革的政治集团,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⑤

田中恭子提出,正是通过土地改革,中共才把农民带入其主导的政治运动之中。农民通过土改运动,明确了阶级区分,强化了阶级意识,他们由此被政治化。所以,对于土改运动要从其政策、目的、实施过程和结果等方面进行综合把握。与此相关,安都根的研究发现,中共在同姓村进行土改的难度要大一些,顽强的共同体对于中共政策的开展不利。^⑥ 还有研究者认为,对于土地改革除关

① 奥村哲『中国の現代史——戦争と社会主義』、青木書店、1999年、100—102頁。

② 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構造と任侠の習俗」、『一橋論叢』第26巻第5号、1951年11月。

③ 浜口重国「中国史上の古代社会問題に関する覚書」、『山梨大学学芸学部研究報告』第4号、1953年12月。

④ 足立啓二『専制国家史論——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柏書房、1998年。

⑤ 田中恭子『土地と権力——中国の農村革命——』、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6年。

⑥ 安都根「査田運動再考——江西ソビエト革命運動の歴史的意義をめぐって——」、『現代中国』第72号、1998年10月。

注区域的社会结合之外,更应注意在原有社会关系被破坏时区域的具体变化。^①

其次,对于土地改革中大众运动容易出现极左倾向的原因,田中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她认为土改这种大众运动和斗争方式后来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运动和斗争方式具有“急进化的内在动力”。由于财富的分配越是绝对平均,权力就会越集中在最贫穷阶层手中,所以斗争越激烈越好。对敌对势力越彻底破坏,中共的支持基础就越强化,革命就会越向前推进。在运动与形势的关系上,1943年到1945年,中共新区扩大,急于发动民众运动,出现急进。在1946年到1947年根据地军事状况出现危机时,更要对阶级敌人进行彻底打击,因此发动农民,所以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急进。中共对于由急进产生的问题也是用激进的政策来解决。1947年均分政策的实行,就是因为随着土地改革的进展,贫农的要求越来越难以满足,因此分配的方法更加复杂,运动日趋扩大。中共相信平等化会激发农民的参加意愿,所以均分政策有时是来自上层的要求,而在村落层面,有时干部和农民是被动的。

小林弘二对中国整个20世纪的农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对中国农业集体化政策从形成到瓦解的过程来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他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及其农村革命理论,认为毛泽东是从一个革命斗争领导者的角度来把握旧中国农村的。毛始终把阶级斗争作为农村调查的重心,他分析了旧乡村统治的基本结构和阶级构成,主张革命就是要打破旧的社会共同体,因而特别关注宗族集团和中间阶级问题。毛进行农村调查主要也是为了与党内“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把调查作为革命实践的一部分。毛泽东将平分土地与社会的重新组织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关于集体化的起源,小林认为集体化的原点是根据地劳动力的组织化。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酷的自然条件出现严峻困难时,只有通过劳动力的组织化才能维持生存。这其中,首先就是“劳武结合”。最开始的变工队是与民兵组织一体的,民兵就是变工队的核心,只有这种组织才能在面对敌人随时可能进剿的情况下实现“抢耕抢收”。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大量青壮年参军,出现了“代耕队”,其规模更大。其次则是“生产度荒”。根据地的“打蝗运动”需要人海战术,兴建水利、开垦荒地、技术改良和副业生产等都需要劳动力的组织合作,这就是互助合作运动的原初形态。^②

内田知行的论著《抗日战争与民众运动》虽然是在2002年出版,但是其收入的主要文章都是20世纪80—90年代发表或写作的。内田强调中共的革命运动就是民众运动,中共将权力一直渗透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提出应重视在以往中共正统史观中被忽视的民众运动,即秘密社会和大生产运动以及互助合作等。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研究,内田认为新富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的互助组是富农、中农或贫农等各阶级独自组成小型互助组,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新富农的带动下出现了由新富农、中农和贫雇农这种不同阶级集合在一起的阶级合作型互助组,其规模也较大。内田指出,在根据地义仓运动中,富裕农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采取阶级调和的路线下才能出现。1945年以后,义仓的经营方式由义田共有、共同耕作方式向交纳余粮方式转变,不久义仓运动也便结束。

对于民众运动的发动,内田同田中恭子一样也注意到社会政治因素,他认为华北根据地的反汉奸清算运动与减租减息运动是密切关联的。由反汉奸所动员起来的民众运动是转向减租减息的必要条件,后者正是前者发展的结果,由此也就必然导致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流血和混乱,并使得这种

① 荒武達朗「抗日戰爭期中国共産党による地域支配の浸透」、『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第25号、2001年。

② 小林弘二『20世紀の農民革命と共産主義運動——中国における農業集団化政策の生成と瓦解』、勁草書房、1997年、80—99頁。

趋势很难制止,这正是“五四指示”提出的必要所在。^① 同样是研究民众运动的佐藤宏特别关注到基层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中共将村落中的精英加以提拔,掀起劳动英雄表彰活动,积极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② 此外,内田对于根据地的鸦片管理政策进行了分析,根据地为了获取军需物资将鸦片向敌占区输出,实行严格的流通管理政策,在根据地内则进行戒烟和对大烟鬼的治疗救济活动,根据地内、外的鸦片政策是不同的。^③

关于革命根据地与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制度传承上的内在联系,谷川真一对于“单位”制进行了系统考察。谷川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组织的角度研究了抗日根据地“单位”制度的形成。他认为,“单位”是一种可以自给自足的多功能组织,是一个“小社会”。其起源于大生产运动中的“机关生产”和合作社。此后“单位”逐渐成了中共对社会基层进行重新改造的手段,这种中间组织不但具有经济和福利功能,而且还担负着识字、政治教育、文化活动等诸多功能。特别是通过整风运动,“单位”领导者的权力大幅扩充。在大生产和整风运动中,“单位”还作为一种大众动员手段被利用。所谓“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工作方法就是这一期间形成的。从“单位”领导者到“积极分子”再到普通民众,依靠“小组”制度贯彻到每一个人。这样,“单位”便成为领导和动员民众的重要组织机制。

谷川认为,这种起源于根据地的“单位”与中国传统的中间组织有连续性,这种组织的自给自足和多机能性使个人需要的大部分都可以通过“单位”得到满足,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个人主义发展的社会传统。在“单位”内部还存在家族主义的伦理观念。根据地内的“劳动英雄”“积极分子”首先是在“单位”内发挥模范作用,他们成为“单位”内部坚决贯彻党的意志的中坚。但是,与传统组织有所不同,在传统中间组织中,其领袖有时发挥着保护自己成员的中间人角色。然而这在“单位”中很少看到,这是中共的“积极分子”与传统精英的不同之处。对这一点,祁建民的研究有所修正,他认为村干部依然具有对村民的庇护功能。^④ 谷川认为,“单位”制度的出现结束了旧社会那种国家与社会隔离的现象,党可以直接控制到社会的最底端。^⑤

关于中共革命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川井伸一对土地改革过程中的血缘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土改中追溯到上一辈来调查地主、富农的阶级成分,对其亲近家族也开展斗争,这是一种农民的“被世袭的社会地位”。按照这种意识所形成的阶级观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阶级划分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⑥ 日本学者较早关注到中国社会的血缘和宗族与政治统治间的关系。仁井田升曾提出“宗族共同体宋代以后再生”说,认为大地主在宗族内部既是统治者也是宗族的维护者,中国社会存在着血缘、地缘以及行会(Guild)和宗教的多重结合关系。^⑦ 这种村落统治与血缘和宗族关系的研究方法,在后来山本真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针对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路线斗争式的方法,今井骏通过对川陕根据地失败原因的分析认为,这不能仅仅归于张国焘的思想和作风问题。土地革命并不是万能的,根据地的军事斗争与土地革

① 内田知行『抗日戦争と民衆運動』、創土社、2002年、159—195頁。

② 佐藤宏「陝甘寧辺区の農村労働英雄と基層指導部」、『中国研究月報』第432号、1984年2月。

③ 内田知行「中国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アヘン管理政策」、『アジア研究』第41巻第4号、1995年8月。

④ 祁建民『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結合と国家権力——近現代華北農村の政治社会構造』、御茶の水書房、2006年。

⑤ 谷川真一「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単位』制度の起源——国家・社会関係の中間組織の視角から——」、『アジア研究』第44巻第4号、1999年2月。

⑥ 川井伸一「土地改革にみる農村の血縁関係」、小林弘二編『中国農村変革再考——伝統農村と変革——』、アジア経済出版会、1987年。

⑦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 奴隸農奴法・家族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年。

命是相辅相成的,而白色阵营的分裂则是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前提。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① 田中仁对于川陕根据地和张国焘有详细研究,他认为当时建立西康、青海和西藏革命根据地的设想是四方面军领导层的共识。^② 这种脱离路线斗争的研究与石川忠雄是一致的。此外,穴户宽等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了实证性研究。^③ 姬田光义和陈平对冀东无人区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④ 宫坂宏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的研究中认为,抗日统一战线教育包括干部教育和识字运动,这在动员民众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⑤

关于革命根据地的肃反问题的研究有福本胜清和小林一美的论著,这些是专门关于中国革命史中所谓“阴暗面”的研究。^⑥ 不过,此前丸田孝志的研究表明,抗日战争时期的“锄奸”工作具有扩大化和稳健化的周期性相互转化的现象,并不是一贯极端。^⑦

四、21 世纪以来的研究:国际对话与多角度创新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活跃以及大量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以一批年轻学者为主,在积极开展与欧美和中国学术界对话、交流的同时,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这一时期虽然专门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学者在数量上已经无法与以前相比,但却呈现出国际化、多视角和高质量成果不断问世的现象。

战后欧美学者在对农民革命问题的研究中曾提出过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和理论,诸如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道德的农民”理论,塞缪尔·皮普金(Samuel Popkin)的“合理的农民”概念等。对于中共革命为什么会获得农民的支持,有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的减租减息经济政策说。毕仰高(Lucien Bianco)提出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最早响应党的并不是贫农,而是不参加生产,属于周边的那些人们,其后这些人才被渐渐排除出去。普拉奇克(James M. Polachek)认为农民的生存战略十分复杂,并不只是一种取向,农村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当危机到来时会同其他集团发生冲突。詹森(Key Ann Johnson)则主张根据地的妇女运动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有时女性的传统角色却会得到强化。^⑧ 日本年轻学者继承日本对于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研究传统,吸取和参照了以上的欧美学者理论开展了实证性研究,并进行国际学术对话。

关于农民拥护中共革命的原因,在日本学界,高桥伸夫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阶级流动性高,党很难与特定阶级形成稳固的联盟,各个阶级都是通过与党建立关系来确保自身的利益。高桥提出,农民支持革命的动机,首先是中共为了动员农民而提供了各种诱因,这包括理念和意识形态(民族主义、道德等)、安全、物质性的直接利益、制度(婚姻自由、减租减息、互助组等)、权利或地位

① 今井駿『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抗日民族統一戦線史研究序説——』、汲古書院、1997 年、36—80 頁。

② 田中仁『1930 年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国共産党の危機と再生——』、勁草書房、2002 年。

③ 穴戸寛他『中国八路军・新四軍史』、河出書房新社、1989 年。

④ 姬田光義、陳平『もうひとつの三光作戦』、青木書房、1989 年。

⑤ 宮坂宏『抗日解放区の国民教育——その政策と法令』、安藤彦太郎『近代日本と中国——日中関係史論集』、汲古書院、1989 年。

⑥ 例如福本勝清の以下著作和論文:『中国革命への挽歌』、亜紀書房、1992 年;『中国共産党外伝』、蒼蒼社、1994 年;『中国革命を駆け抜けたアウトローたち土匪と流氓の世界』、中公新書、1998 年;『コンミュニンの悲劇——中国革命根拠地肅清運動史 1930—1937』(1—10)、『中国研究月報』518—540、1991—1993 年。2013 年 10 月,小林一美出版了『中共革命根拠地ドキュメント:一九三〇年代、コミンテルン、毛沢東、赤色テロリズム、党内大粛清』一书,长达 600 多页,系统研究了根据地的肃反活动。

⑦ 丸田孝志『抗日戦争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锄奸政策』、『史学研究』第 199 号、1993 年 2 月。

⑧ 参见恒川惠市『第三世界の農村と政治体制——理論の現状と研究の課題——』、日本政治学会編『年報政治学一九八六年第三世界の政治発展』、岩波書店、1987 年。高桥伸夫『党と農民——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研文出版、2006 年、191—197 頁。

以及名誉等。农民都是根据纯粹个人的打算,通过参加革命来满足其不同需求,因而不能只强调道德或利益的一个方面。^① 高桥修正了道德农民说和合理农民说的观点。日本学者在中国与日本和欧洲传统社会的比较中较早发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主义、非身份性和阶层之间流动性高的特征。对此,宫崎市定、滋贺秀三有深入研究。^② 20世纪40年代,参与中国华北农村调查的戒能通孝就指出中国社会的非身份性特征。^③ 其后,水林彪、足立启二又有详细论证。^④ 这种非身份社会说在根据地研究中被广泛接受并深化。

石岛纪之认为,农民对于中共的支持虽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转变^⑤,但是,在根据地内农民的生活确实得到改善,他们对于中共的支持不是有限的。抗日战争期间民众对于日军的残暴侵略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反抗或是现实地对敌服从,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或者反抗,或者服从,不是一直固定的。根据地农民对于中共基本上是支持的。石岛通过对太行根据地的考察发现,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多数农民获得利益,这是农民支持中共的主要原因,而“自我保护”“对旧统治者的仇恨”以及来自中共上级的“强制”等因素虽然存在,但不能说农民对于中共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⑥

石岛在《中国民众的中日战争》一书中对于太行根据地的反贪污与合理负担,以及人权保障、累进税、三三制等政策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在抗日根据地里,地主占有的土地大大减少,随着中农的增加,贫农也有所减少,由此形成了支持抗战的社会体制。^⑦ 这些政策使得根据地虽然贫穷但是相对平均,成功地使战争的负担公平化,提高了农民的抗战意愿。^⑧ 有学者说,在“革命史观”研究急剧衰退并在日本丧失魅力的背景下,该书对于中共在敌后艰苦抗战,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并实现了一定公平的伟业进行正面肯定,可谓独树一帜。^⑨ 此外,田原史起发现,在农村积极响应中共的往往是那些能说会道的人,而老实的农民一般难以做到。这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毕仰高的观点。^⑩

高桥伸夫是新一代学者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他对于以往的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关于党和农民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概念和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散漫的党”和党对农民的“随意包容”战略等概念。关于“散漫的党”这一概念,他认为,以往的研究,把中共看成是下级完全服从上级,党是一个一致性整体的认识。但是,散布在全国各个偏僻地区的根据地,党中央的指示由于落后的通讯手段而不能及时传达,地方的党组织在孤立的环境下经常需要独立判断,要根据各自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开展活动,他们并不仅是中央政策的传声筒。由于“散漫的党”对外开放性很高,其成员经常处于流动的状态,凝聚力低,其组织内部的信息传导不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不顺畅,党组织

① 高桥伸夫『党と農民 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190—206頁。

② 宫崎市定『中国史』(上下)、岩波全書、1998年、65—81頁。滋賀秀三『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創文社、1984。

③ 戒能通孝「支那土地法慣行序説」、東亜研究所編『支那農村慣行調査報告書』第一輯、1943年。

④ 水林彪『封建制の成立と日本社会の成立』、山川出版社、1987年、452頁。足立啓二『専制国家史論——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柏書房、1998年。

⑤ 参見石田米子、内田知行『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創土社、2004年、56—65頁。

⑥ 石島紀之「抗日根拠地における戦争動員と民衆——太行抗日根拠地を事例に——」、『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18号、2011年。

⑦ 石島紀之『中国民衆にとっての日中戦争——飢餓、社会改革、ナショナリズム』、研文出版、2014年。

⑧ 石島紀之著、李秉奎等译:《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⑨ 丸田孝志「書評『中国民衆にとっての日中戦争——飢餓、社会改革、ナショナリズム』」、『アジア研究』第62卷第2号、2016年4月。

⑩ 田原史起『二十世紀中国の革命と農村』、山川出版社、2008年、38—42頁。

与外部社会的界限也并不鲜明。至于党对农民的“随意包容”战略,高桥认为,农民不是完全被动无力的存在,他们通过个人或由集团动员起来的能量,对于上级传达的指令,会从下而上用其独自的方法来对应。他们总是会根据利害得失进行策略选择,以适应新的统治势力。中共对农民的“随意包容”战略有两层意思:第一,农民对于党的权力不是彻底服从,但也不是露骨地抵抗。农民对于党的权力是一种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彻底抵抗的中间状态。第二,农村社会内部对于党的权力既不是一部分阶级接受、一部分阶级反对,也不是超越阶级的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与党应对,而是以个人或集团的地缘、血缘等结合的形式展开。关于中国的社会结合问题,以往多认为是“一盘散沙”,但是,近年日本学者发现,中国的社会中间集团具有多样性,虽然多是一种防卫性、非制度性的相互扶助团体,但在有些时候却具有强大的凝聚力。^① 人们的亲疏关系在一定场合下会非常牢固。^② 高桥就注意到了中国社会集团的这种多面性特征并运用在革命根据地研究中。

高桥认为,中共这种“散漫的党”与农民是一种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他提出在根据地研究中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强调党中央的意图与革命现场之间存在着隔阂。党中央的意见往往被各地的“散漫的党”改变、无视,甚至会按照自己的见解加以利用,而农民也根据自己的立场来接受。这就造成了革命过程的不确定性。第二,强调在地理或空间上革命的多元性或多样性。各个根据地按照各自的特点独立开展革命,其总和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形象,革命并不是一个模式的。第三,要有意图地摆脱农民是容易变化的这种观点,强调农民不容易改变的方面和农村社会传统的延续性。他提出,那种认为中共给农村带来巨大变革的观点过于简单。从表面上看,农村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剧烈变革,实际上在其背后农民和农村社会却存在着顽强的连续性。

通过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具体研究,高桥提出,党员并不是以某个特定的阶级为主,党员的构成非常复杂,甚至还包括党组织本来要排斥和警惕的那些人。他们入党的动机也各式各样,党组织利用血缘、地缘以及其他的村落内部关系将其发展到党内。这种随意包容的战略有强弱两方面,弱的方面就是难以得到对革命绝对忠诚、拥有铁的纪律的党员,强的地方是可以在革命高潮的时候迅速获得大量精于算计、有机会主义想法的人参加革命。根据对闽西根据地的研究,他指出,在根据地内部,阶级阵线的划分并不鲜明。在农村生活的人,并不完全归属于某个特定阶级,而是根据个人或集团的战略,同“散漫的党”组织按照自己的立场进行交往。在苏区,工人阶级大多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贫农分到土地后便趋于保守,地主和富农也会进入党内。相反,与阶级区分或各个阶层都有其基本态度的状况不同,一般说来,青年和妇女往往会成为革命的骨干和先锋。根据地的党非常善于动员青年,青年人狂热地参加暴动。党提倡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也会得到妇女的支持。

高桥根据自己对革命根据地的长期研究得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很难证明中共与农村的某个特定阶级具有天然的联系。从经济结构来分析哪个阶级同中共必然会结成同盟是没有必要的。第二,关于农民参加革命的动机,面对中共的各种政策,农民是根据个人的利害得失进行选择,除了个人的利害之外,他们还要作为宗族、家族、集团或同辈、同性别群体的一员加以考虑。虽然中国农村共同体涣散,便于中共的进入,但是在同姓村中革命也不好展开。第三,革命与农村社会传统的关系。农民被要求适应党所带来的文化,但是,党也不得不适应农村的传统文化,农民中的一些人要利用革命来摆脱传统文化,但是,党却有意保留一些传统。当然女性和青年大多对传统持批评态度。农村的一些传统关系例如宗族、地缘结合和个人间的恩仇也往往利用革命过程来强化。基于此,高桥对根据地中关于党和农民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根据农民的战略选择来

① 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論と中国』、『歴史評論』第527号、1994年3月。

② 園田茂人『中国人の心理と行動』、日本放送協会、2002年。

研究根据地党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对于党并不是唯唯诺诺,而是能动、主动地参加这场政治游戏。第二,对于党员进行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分析。以往对于党员仅仅进行阶级分析,其实,党组织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场所,包括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农民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等等。第三,从中国固有的历史脉络中研究中国革命,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化中把握中国革命。从王朝时代对农村的统治,到近代国民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等。^①

此外,高桥还对根据地的两性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要发动革命,推翻旧体制,就必须聚集巨大的能量,将解放的理念最大限度地高扬起来,由此加入革命的就会有抱着各种目的投身进来的势力。根据地提倡“婚姻完全自主”的婚姻革命,给农村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同样也有年轻人对传统社会的激烈反抗。这是革命带来的次生的性别和代际之间的冲突。年轻女性剪短发参加革命,除了因为自由婚姻,也为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年轻男子参加革命除了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也有向长辈们所制定的旧社会规范进行反抗的意味。这种反抗有时会十分激烈,这在根据地创建初期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看到。对于这种激进的行为,共产党为了维护适当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秩序,有时也不得不加以控制。^②关于根据地妇女运动,江上幸子就认为,由于这种运动的负向作用,根据地在一定时期强调要重视家庭和睦。^③石岛纪之指出,在维持家庭和睦与打破对妇女的束缚方面,根据地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党内也有意见分歧。当反对妇女运动的意见较多时,党便把妇女运动的内容转变为以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其后,妇女工作也逐渐走入规范和低潮。^④对于根据地内的妇女解放问题,相原里美通过对丁玲小说《夜》的分析,揭示了根据地中女性作家的苦闷。丁玲作为一名党员必须为社会全体解放而奋斗,但是同时作为一名妇女解放主义者,对于根据地内人们意识中潜在的封建观念也深有感触,她就是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不断挣扎。^⑤

丸田孝志则是运用新方法对革命根据地研究的代表者。他对根据地在时间、象征、民俗、信仰等层面的政治宣传、动员工作进行了系统和开创性的研究,引人注目。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欧美还是日本学界都开始从近代化过程中传统的中断与延续和国民形成的角度展开研究,社会史研究急速发展,家族、农村社会、环境、社会集团、民俗、身体、两性等成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受年鉴学派、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文本、话语、记忆、象征成为重要研究对象,研究者要从人的意识与实际状况的关系上重新构筑历史,因而历史叙述呈现出多样性。二宫宏之等将法国社会史方法介绍到日本,产生很大影响。^⑥丸田在这方面的成果代表了日本学界在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对新方法的探索。

时间和纪念日与特定集团的共同记忆相关,权力通过这种记忆向人们灌输其正统性,按照这种价值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丸田孝志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纪念日的设立及其活动和新历、农历的使用发现,随着中共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换,中共在根据地的原有国际共运和中共自身的纪念日、大众运动和归属集团(青年、妇女、工人等)纪念日之外又加上了国民政府方面的纪念日和象征抗日战争及国际统一战线的纪念日。每当在纪念日前后都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共政策进

① 高桥伸夫『党と農民 中国農民革命の再検討』。

② 高桥伸夫「第6章 党、農村革命、两性関係」、高桥伸夫編『救国、動員、秩序——変革期中国の政治と社会』、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155—178頁。

③ 江上幸子「抗戦期の辺区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女性運動とその方針転換——雑誌『中国婦女』を中心に」、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集委員会編『中国の伝統社会と家族』、汲古書院、1993年。

④ 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184—191頁。

⑤ 相原里美「延安解放区における作家の苦悶——丁玲『夜』を中心に——」、『関西外国語大学研究論集』第93号、2011年3月。

⑥ 参见『二宮宏之著作集』、岩波書店、2011年。

行广泛宣传,设定动员目标,以纪念日为政治动员的时间起点和终点,把余暇和娱乐时间利用起来,将其政治意义共有,通过对于时间的规范确立起动员体制。

另一方面,边区还利用社会上延续使用的农历开展对民众的组织和动员。在传统节日、庙会、赶集等农历节日,按照当地的习俗进行各种宣传,以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确立新政权的权威。在晋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以前对于国民政府的节日比较重视,但是由于此后国共关系恶化,除继续纪念民国系统国庆节,对于其他民国政府纪念日则基本停止纪念,显示了与国民政府的对抗。根据地还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农业生产,创设区和村的翻身解放日,以增加乡村社会的凝聚力。

在国旗和领袖像等政治象征方面,丸田对于根据地的国旗和领袖肖像悬挂方法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开始悬挂国共两党党旗和蒋介石、毛泽东像,显示国共合作。当国民参政会成立后,延安则开始悬挂国旗,将根据地作为中华民国的正统继承者来加以宣传。整风运动之后,由于毛泽东地位的提高,毛泽东像和国旗并用的形式得到普及。在晋东南根据地,最初是国旗和孙中山、蒋介石像被尊重,以后由于国共关系恶化,在1940年到1941年上半年,朱德像一时被作为最高权威。1941年以后,作为孙中山权威的继承者,毛泽东像便具有了最高地位。在太行和太岳根据地,从1944年到内战土地改革时期,通过人生仪式、村落活动等,代替过去神像的毛泽东像被迅速普及。在由诸多神仙承担各种现世利益的中国民俗信仰中,毛泽东像被放在负责家庭繁荣幸福的神的位置上。在内战、土地改革过程中,前线状况不安,被神化的毛泽东在入党、立功和整党运动中,作为党和农民权威的象征被强调出来。

丸田认为,中国民众在传统上具有平均主义思想,中共的土地改革就是要实现最底层民众的这种理想,而能够实现这种理想的“真命天子”就是毛泽东,他的形象成为人民权力的象征。同时,中共强调自我牺牲精神的标语“为人民服务”也得以确立。由此,要听从领导人民革命的这位英明领袖的领导,将其作为一种体制就体现了中国传统观念中把民意作为天意的民本思想。^①近年日本史学界和人类学界对于政治象征的研究成果不少。^②关于毛泽东肖像与毛在党内权威形成过程中相互关系的研究还有川田进、韩敏等人的成果。^③

在对根据地仪式的研究中,丸田提出,在许多方面,旧的传统得到了利用。例如在立功运动和奖励各种模范时,模仿了过去科举及第的庆祝、彰显仪式。根据地的追悼仪式被作为激发人民大众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情绪的手段而被利用。这时,那些带有农民宗族意识、家庭意识,甚至与迷信有关的活动也被利用,村落中举办的追悼仪式就体现了这点。作为“地主文化”的一些做法,这时则成为地位上升了的农民们所喜爱的仪式。这显示出身份不固定的中国农村社会中阶级间文化的相互模仿与交流的情况。为了强化村落的组织性,便于在村落的动员,根据地还实行模范村运动,包括举办祝寿会和集体婚礼等。

丸田不仅对根据地的时间、象征和仪式进行研究,还对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众动员和中共组织状况进行分析。对于中共组织,他揭示出与高桥伸夫所提出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散漫的党”所不一样的情形。在抗战以后,党组织通过掌握情报、审查干部、整顿支部等,加强组织治理,使得党的组织性得到强化。在社会控制方面,通过内战时期的出身和成分划分,中共实现了对人们的政治等级区分。中共在下层民众中培养的积极分子,加上党员、干部,形成了三个层次。但

① 丸田孝志『革命の儀礼 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2013年。

② 参見小野寺史郎「最近十年來の近代中国政治シンボル研究の展開」、『近きに在りて』第52号、2007年11月。

③ 川田進「毛沢東の肖像に見る権力象徴化の過程」、『野草』第65号、2000年2月;韓敏編著『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的人类学的アプローチ——』、風響社、2009年。

对于敌对面的阶级区分,则往往根据其政治态度、过去的经历以及家族和生活状况而任意划分,这显示出中国社会中人们的起伏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在严格的区分中允许一定的灵活性,这可以迫使人们更加忠诚。运用与社会结合原理不同的阶级划分,将每个人区分开来,使其服从于中共是阶级区分的重要目的。传统中国社会身份并不固定,人们同时存在着没落的危机和上升的机会,对于土地改革和“文革”时的出身血统主义,丸田认为,这是人们为了上升或避免没落而对自身的地位和实力进行的一种“夸示”。所以,划分阶级这样的权威序列化正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继承日本实证史学传统并用社会史方法对于特定区域的革命根据地进行深入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山本真对于福建根据地的研究。由于福建地区宗族势力强大,近代以来产业结构变化明显,所以山本是从宗族和社会经济结构这两方面对革命根据地展开分析的。关于中国宗族问题的研究,早在战前,日本研究中国共同体具体形态时就有牧野巽等人对于汉代家族的研究。^①宗族一直是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对象,在根据地研究中也是如此。

山本真首先研究了民国时期福建的社会政治生态,他认为,由于军事势力的割据和剥削,大宗族向弱小宗族转嫁负担,导致了区域社会矛盾的激化,出现了“各个小集团的武装化和相互争夺”的“散沙”状况。试图消灭这种状态的社会中坚势力就是那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精英,他们当中的激进派提出不仅要在军事上打破这种状况,而且要否定由宗族长老等构成的保守势力及其秩序。另外,在民众方面,他们是否会依附于以中共为背景的新领导者,这要由他们所属于的宗族和村落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受到大宗族压迫的弱小宗族、在宗族内部分化出来的贫困阶层等受到传统宗族庇护较少的人群或集团就具有投靠中共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是被压抑的阶层要参加革命也带有一定冒险性,为了动员他们,通过那些容易获得族人信赖的同族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宣传和组织就十分必要。

在既得权益较多的有势力的宗族内部,中共动员民众就比较困难。由权力较大的领袖所掌握的宗族,对于红军的进入往往进行反抗。将特定宗族的土地分配给其他宗族的土地改革更会受到激烈抵抗。突破宗族关系的阶级意识在形成过程中会受到同族观念和地方主义的顽强抵抗。不过,贫困阶层都要求分配族田,这是土改的动力所在。在宗族和地域间的怨恨由中共加以诱导以发动革命的时候,宗族结合往往会成为暴动初期动员农民的“革命纽带”,当这种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宗族将阻碍革命的发生。同样,郑浩澜的研究也显示,对于革命根据地的研究除了要关注阶级关系之外,还应注意到其他社会群体,比如宗族、会门以及女性、移民等区域社会中各种群体的状况和立场。她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研究表明,革命并没有将宗族彻底破坏,反而宗族成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开展的基础,有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也不分明。^②

山本真发现,在红军占领地区,依靠外部势力所进行的推翻旧统治者的革命和土地改革会受到一些传统制度的影响。例如在福建省西部地区,地权包括所有权和耕作权这样的双重权力。耕作权十分重要,因此,在土改之后,原来具有耕作权的中间阶层一般还继续耕种原来的土地,由此他们便相对富裕,中共后来将他们划为富农进行打击,由此引起这些势力的反抗。中共为了用阶级重新组织社会,就须要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通过对青年人进行教育,发动他们破坏祠堂和庙宇,但这却遭到壮年和老年人的反对,在这里要去除传统习惯和意识会十分艰难。

关于中共革命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山本注意到福建西南部地区都是山区,耕地缺乏,农业生产比重较小,而林业、手工业(竹纸、烟草、印书业、铁器制造)和运输业(挑担脚夫)的从业者却十

① 牧野巽「漢代における家族の大きさ」、『漢学会雑誌』第3巻第2号、1935年10月。

② 郑浩澜『中国農村社会と革命——井冈山の村落の歴史の変遷』、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9年。

分庞大。他们较多集中在造纸和烟草等较发达的行业。但是,从清末开始,由于交通手段的变化和洋货的流入,地方产业迅速衰退。不过烟草业变化比较缓慢,造纸业在革命暴动时依然兴盛,所以,经济衰退并不波及所有产业,应该根据具体产业进行分析。为了维护经济来源,一些由权威族长领导的宗族拥有武装组织和民团对共产革命进行了抵抗。另一方面,在上杭县才溪乡,由于有大量的建筑业工人,他们习惯于在外地的集体生活,因而有许多男子参加了红军,而没有缠足习惯的客家妇女则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支援前方,所以,这一地区参军比例很高。这样看来,山区的产业状况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这一地区在传统上外出打工者比较集中去的地方往往是广东、江西、福建的交界地带,这正好与中央苏区相重合,这一点值得重视。^①

一谷和郎对根据地财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根据地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就是保障庞大军队的补给,由此必须确立战争财政。太岳根据地的军费要占到财政支出的80%以上,根据地便不得不尽量抑制兵员的规模,由此才能长期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根据地努力做到负担公平、透明,将租税负担扩大到各个阶层。所以,单纯拥有巨大的兵员并不能保证中共根据地的存在。根据地在最低限度地依靠民兵这样的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不得以防守为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根据地坚持下来。^②

小林一美对于中央根据地的客家人与土地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毛泽东以及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实行了对当地领导阶层即地主的消灭政策,将他们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村中将公田和公共财产没收。这对于拥有较多公田并以族长为中心的共同体色彩较强的客家社会来说,是对于他们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全面否定和破坏,由此引发了他们对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反抗。那些最初发动革命的,建立起江西、福建革命根据地的本地革命者,有许多人对于党的打倒富农路线、没收公田政策持反对意见,但结果他们被当作AB团、富农分子、社会革命党分子杀害。^③

井上久士对于冀中根据地在“五一大扫荡”之后的重建过程进行了分析。在大扫荡之后,八路军主力返回冀中,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大力减轻农民负担,针对农民上层,特别是那些与日军勾结的地主开展斗争,没收“汉奸的土地”和“由村里管理的逃亡农民土地”,优先分配给抗日军人家属,由此使得八路军更加得到农民的支持。同时,由于在反“五一大扫荡”中,加强了党对政权、军队和民众的领导,迅速恢复了组织。这样,在北岳区实行的三三制在冀中区便没有完全实行,这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结果,但是为了重新建立根据地也不得不这样做。^④ 田中仁认为,在根据地内部,县作为一个政治空间发挥了重要职能,以县为单位开展各种定额竞赛,把对于灾民的救济、优待“抗属”、保证生活与扩军结合起来。同时,在老人、女性和少年之间,地方社会动员也广泛开展。^⑤ 奥村哲认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由于实行总体战,使得社会凝聚力增强,这时所形成的战时动员体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阶级成分的固化有关。^⑥ 他还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不固定并且流动性很高的社会,但是,出身血统主义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形成,并在共和国成立之后

① 山本真『近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と国家——福建省での革命、行政の制度化、戦時動員——』、創土社、2016年。

② 一谷和郎「革命の財政学——財政側面からみた日中戦争期の共産党支配」、高橋伸夫編『救国、動員、秩序——変革期中国の政治と社会』、179—202頁。

③ 小林一美「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における客家と土地革命戦争」、『人文研究』(神奈川大学人文学会誌)第155号、2005年3月。

④ 井上久士「華北抗日根据地における戦争動員と民衆——河北省中部の事例に——」、『環日本海研究年報』第19号、2012年。

⑤ 田中仁「ポスト革命時代の歴史叙述——革命の語り、戦争の記憶」、田中仁編『共進化する現代中国研究——地域研究の新たなプラットフォーム——』、大阪大学出版会、2012年、255—281頁。

⑥ 奥村哲『中国の現代史——戦争と社会主義——』、青木書店、1999年。

被固定了下来的。^①

大原信一对于根据地识字运动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具体政策和活动上,而是分析了广大农民识字的内在动力。这包括:在批斗汉奸、组织人民审判过程中对于新的政治产生责任感,有了参与的欲望;由于减租减息,农民生活改善,他们有了学习文化的兴趣;在发展副业、互助合作中,需要通信、记账、记录等,这些都需要学习文化和识字。^② 对抗日根据地工业合作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有菊池一隆的有关成果。^③ 安井三吉对于根据地日本反战同盟的活动进行了研究。^④

关于革命根据地中的民族、宗教和秘密结社问题的研究近年也受到重视。对于秘密社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三谷孝的研究,其后有马场毅的专著出版,对此孙江也有系统研究。^⑤ 黄东兰以山西黎城暴动为线索,系统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黎城地区村落的社会状况,提出了“双重暴力”的观点,所谓“双重暴力”,一种是由于日军扫荡所带来的来自外部的暴力,另一种是潜藏在村落内部的暴力。日军的扫荡使村民陷入恐怖的深渊,而扫荡也加深了村落内部的对立。在抗战的名义下,一些村干部借助八路军和中共地方政府的力量将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当作“汉奸”处理,由此,日军扫荡这种外部暴力强化了村落内部的暴力行为。^⑥ 祁建民通过对大青山根据地的研究揭示出在蒙疆的抗日根据地对蒙古族采取团结优待政策,对于伪军、土匪等亲日势力和非抗日势力采取灵活的“互不侵犯”政策,由于伪军是脚踩两只船的机会主义分子,八路军活动时要照顾到他们的面子,对于土匪则把他们引向敌占区活动,以减少对根据地的危害。正是由于这些灵活策略才保证了根据地能够在艰苦环境下坚持下来。^⑦

五、结语

纵观90年来日本的中共革命根据地研究,从战前的情报调查到战后初期的好奇、同情,再到对于革命的反思,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国际交流扩大和研究创新,其显著特点就是将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纳入到近现代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在战后初期,与日本东洋史学界否定共同体论和停滞论的潮流一样,他们通过对于中国共产革命的研究,揭示出了中国社会共同体是如何延续并被打破的。此后,日本学者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一个非共同体的社会中,中共是如何对社会进行动员和组织的。他们较早突破了阶级分析的单一方法,关注到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集团和各种社会关系。在研究对象和概念上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从民众史角度研究中国革命。日本学者较早认识到阶级论和王朝史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把民众作为历史的主角,从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心性上把握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共政策的形成过程。第二,关注到中国社会非身份制和个人主义的特征。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层并不固定,经常流动,个人选择有很大的

① 奥村哲『中国の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 近現代史像の再構成』、桜井書店、2004年。

② 大原信一「華北抗日根拠地野識字運動」、『同志社外国文学研究』第76号、1997年1月。

③ 菊池一隆『中国工業合作運動史の研究』、汲古書院、2002年。

④ 安井三吉「抗日戦争時期解放区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運動」、『近きに在りて』第3号、1983年3月。

⑤ 三谷孝:《抗日战争中的红枪会》,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馬場毅『近代中国華北民衆と紅槍会』、汲古書院、2001年;孫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書院、2007年。

⑥ 黄東蘭「革命、戦争と村——日中戦争期山西省黎城県的事例から」、平野健一郎編『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東洋文庫、2007年、207—232頁。

⑦ 祁建民「第9章 蒙疆地方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抗日運動」、内田知行、柴田善雅編『日本の蒙疆占領 1937—1945』、研文出版、2007年、275—302頁。

空间。他们参加革命往往是从个人或集团的利害、观念出发,并不仅仅限定于特定阶级。但是,中国的社会集团也并不是完全涣散,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变得十分强固。革命就是激发和强化了中国社会的某种集体性机制并进行重组。第三,从乡绅论出发,引申出对于根据地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各种模范的研究。战前日本调查就关注到所谓“权势者”和乡绅,战后对于乡绅、精英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既关注到农村干部、积极分子在党和农民间的纽带作用以及中共推进工作的典型方法,也注意到村落精英依然具有保护村落成员的意识 and 机能。第四,对于宗族的系谱性和机能性都有关注。中国宗族的系谱性很强,带有儒学宗法文化色彩,但是宗族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在现实生活中也发挥着机能性作用,因而在与革命的关系上会非常复杂。另外,早在战后初期,日本学者就开始关注土地改革的广泛内涵,认为土地改革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还包括村落权力、权威结构的重新调整。认为农民参加土改首先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安全以及恩仇关系和道德观念上的需求,其次才是经济利益。

另外,日本学界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特点:第一,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实证研究。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就已开始调查收集根据地资料,即使是在冷战时期,日本学者也根据当时能得到的根据地报刊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文献公开和交流的扩大,日本学者不但广泛利用中方文献,还对近代以来日本关于中国的调查资料加以整理利用,加上日本资料共享体制,使得文献使用上较为便利。第二,注重细节、个性和偶然性问题。日本学者较少受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观的影响,对于社会现象的细节和个性比较关注。在日本史学界,关于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社会特征的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便基本结束,学界对于宏观理论问题的探讨基本失去兴趣,多关注细小问题。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微观问题时关注到一些宏观理论,但是,仅仅通过个别现象的研究不足以充分地、为宏观理论提供论据。第三,将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与日本实证传统结合起来。日本学者较早关注欧美学者关于农民与革命问题的争论以及年鉴学派的史学方法,并开展对话。但是,他们相对于理论方法上的探讨与争论,更加关注结合文献和实证方法传统在具体研究中积极加以运用和论证。由于有新理论的视野加上实证研究的功底,所以出现了一批关于根据地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王来特)



Chengdu. However, the careless omissions and mistak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sposal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its ruling logic and ability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and the Internal Disputes in Japan in 1941 Zhang Zhan(68)

After recognizing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r consumptions, decided to give priority to obtaining war resources in the occupied areas. This policy brought great practical pressure to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Wang Jingwei was eager to visit Japan and requir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o adjust its policy towards Wang, but it was repeatedly reject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 main cause of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in 1941 was that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rgans in China reached a consensus out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jointly press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process also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l interests competitions in Japan.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ecided to give Wang high-standard treatment, but did not make substantive adjustments to its policy.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eventually evolved from a political event expected by him into an ordinary ceremonial visit, which was also the result of a balance of disputes within Japan.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Detention by the British-Myanmar authorities to the Foreign Loan Materials for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uo Shuangwen, Ye Xin(81)

The Distribution, Reception and Use of Japan's Compensation Materials shipped to Shanghai after the World War II, 1947 – 1958 Xu Kun(99)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ecided to accept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in advance and to bear the costs of transportation, storage, unloading and reloading. Facing multiple restrictions on funds, capacities and technologies, the Commission, with the help of concerned Ministries and Committees, reluctantly shipped all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o Shanghai Port. However, after being handed over to the concerned units, they were unable to be repaired, reloaded and used. In 1949, when the Kuomintang's defeat was inevitable, it began to demolish and transfer compensation materials and even destroy materials that could not be transported away. With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the new established government began to take over the deployment, reloading and use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e overall plans and effectively used these materials to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the three-year economic recovery period, and to strengthen the iron and steel smelting an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Japan Qi Jianmin(114)

Liu Danian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Zhenkun(134)

A Work of Ultimate Rescue and Standardization—Comment on *The Memory of War: The Oral History of 100 Veteran Soldie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Li Jifeng(138)

Re-exploring the Truth through *Truth* Zhang Jingwei(14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A Summary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Regional Research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Resistance in Hunan Luo Yunsheng(144)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the Study of the Resistance History in South China Li Hao(149)

A Summary of the Sixth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o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g Siji(153)